

论木心散文中的“母亲”

骆俊彦¹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上海 200433)

【摘要】:“母亲”是木心散文中形象鲜明的人物,其言语和行为无不闪耀着智慧之光。以“母亲”这个人物为论述主轴,探讨她在个别篇章中具有什么象征意义,以及在木心散文的整体中具有什么功能。通过对《童年随之而去》《战后嘉年华》《夏明珠》《第一个美国朋友》四个文本的分析,来论证“母亲”对于木心散文叙述者的主体精神之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木心 母亲 智者原型 罪感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20)02-0028-05

木心的散文^①,尤其是那些具有追忆往昔性质的叙事,常出现“母亲”这个人物。由于其散文多为第一人称视角,夹带鲜明的自传色彩,叙述传神煞有介事,使得读者容易陷入“信以为真”的境地,误以为文中的“母亲”写的就是作者现实中的母亲。为避免此类窘况,作者在《温莎墓园日记》的“序”中有意提点读者注意其散文的虚构性。“袋子是假的,袋子里的东西是真的。当袋子是真的时,袋子里的东西是假的了。”^{[1]18}木心十分警醒于叙事/虚构只是作者编织的袋子,而编织袋子的目的则在于“袋子里的东西”;他在《散文一集》的“序”中更清晰地写道,“渔民的目的物是鱼,不是书”^{[2]7}。这说明了,现实中作者的母亲仅作为其创作的“蓝本”/“原型”。现实生活中,作者或许有一位言行如此充满智慧的母亲,这位母亲也可能曾遭遇文中所写之事,但对于作品意义之阐述,不符合史实的问题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木心创作时已有意将“母亲”的形象“艺术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自己放进去”^{[3]47-5(1)}。那么,“袋子里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说,“母亲”这个形象在作者的艺术整体中闪耀着什么意义,倒是一个应该重视的问题。无论是自传性较强的散文,如《战后嘉年华》,还是虚构性较鲜明的短篇小说,如《第一个美国朋友》《寿衣》,抑或直接以“母亲”为主角的《夏明珠》,“母亲”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的一言一行都饱含智慧,读者会感觉这位分散在不同篇章里的“母亲”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母亲”这一角色在木心的散文中具有典型性。既然作者有意识地在“讲故事”时“把自己放进去”,“母亲”的典型性也必然是朝着作者的艺术目的而被创造的。那这一典型形象具有什么象征意义,将是下文欲探讨的。

一、《童年随之而去》的隐喻及“母亲”的“预言”

“丢失的小盥”是木心在《童年随之而去》中创造的意象。不满十岁的叙述者随母亲和家中女眷上山做佛事。为了哄叙述者吃饭,庵里的当家和尚拿出珍藏的越窑小盥赠与叙述者。佛事毕后,叙述者忘了带走小盥,母亲吩咐船夫上山索取。叙述者“似乎非常清楚那盥是有一无二”的,当船夫“两手空空地奔近来,我(叙述者)感到不祥——碗没了!找不到,或是打破了”^{[2]46-48}。这个预感随即应验:叙述者舀水清洗船夫带回来的盥时,意外脱手而将它丢失在河中。他当下的反应是“望着望不见的东西——醒不过来了”^{[2]48}。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将“小盥”和叙述者的“童年”做了一次象征的联系,“那时,那浮余的盥,随之而去的仅是我的童年。”^{[2]49}小盥的丢失使叙述者醒悟于万物可朽的真谛,珍贵的东西也无例外。这对于“我”,是对死亡(醒不过来)的一次启蒙。

作者简介: 骆俊彦(1989—),男,马来西亚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者在文中已点明“小盃”与“童年”的象征关系。这个象征十分耐人寻味。“越窑小盃”是一种名贵的瓷器。西方早期的瓷器制造技术远落后于中国,上层社会所需要的瓷器主要依赖中国进口,因此,西文的“china”一词成了指称高等(透光度好的)瓷器的名词。木心有意识地以“瓷”来喻中国传统文化。他在纽约时曾构想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提名“瓷国回忆录”,透露了他重视“瓷”和“中国”的象征意义。由此可见,“我”所失去的不仅是一个未知可朽/死亡之真谛的孩子原有的快乐童年,更是一个“文化原乡”——文化的童年/过往。

中国文化的“童年”之逝去,在文中早已有所暗示。“庵”理应为尼姑的道场,“睡狮庵”里当家的却是和尚“大法师”。这个名与实不相符的问题只有“该懂的不懂,不该懂的却懂了些”的孩童叙述者察觉到,大人们却对眼见的问题采取“也不问问”的态度。孩童的视角与大人的所见形成不协调,通过孩童的口吻叙述便形成了反讽。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丧失了其“童年”的意义,并不是指时间进程中文化演变的损益,而纯粹指涉文化中丧失了“纯真”;换言之,对于“真”的思索与执着在民族文化中消失了。“躲在房里抽金鼠牌、美丽牌香烟的老和尚”“关在庵后山洞里的疯僧”,都留下让读者猜想的空间——庵里一定发生过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人们却不假思索,甚至习以为常。这些皆在暗示文化的“伪”。木心似乎喜欢调侃和尚、尼姑、道士的道貌岸然,他利用中国古典小说中以修道者为素材的小说进行改写,从而凸显传统文化丧失“真”的主题。《大宋母仪》改写自《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七《西山观设鞦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迫活命》,充分展现了修道者借伦理道德的外衣行不伦不德的荒淫之事。

针对《童年随之而去》的取名,木心曾说:“六字已多了,但有转折,‘童年’转成‘随之而去’。”^{[4]80}作者通过“我”的“童年”的转折,带出中国文化面临转折的主题,而此“转折”的实际意义是,传统文化中可贵的精神(贵族精神)之消失。在传统文化式微的隐喻意义下,小盃丢失的结局是必然的。文化里珍贵东西的丢失即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母亲”的“预言”就充满了意义和智慧。这句“很轻很轻”的“预言”其实是“母亲”作为一个过来人以其经验给后生提示的智慧。与其说“母亲”是预言者,毋宁说她是智慧的过来人:“有人会捞得的,就是沉了,将来有人会捞起来的。只要不碎就好……这种事以后多着呢。”^{[2]49}“母亲”的话使“我”意识到一切都会崩溃的悲观的同时,又肯定希望的存在。“童年”虽然已去,但比“童年”更珍贵的母亲的“预(鉴)言”却沉淀在叙述者的内心,酝酿成一种精神。从《童年随之而去》可以看出,“母亲”的智慧对于木心散文叙述者的精神建构有着关键的作用。

二、作为“智者原型”的“母亲”

《童年随之而去》的叙述者丧失小盃的同时,“母亲”的“预言”使叙述者建立起一种坦然面对现实的态度。“母亲”对于叙述者精神之建构的影响,首先在于对“诚”的肯定。《战后嘉年华》是一篇杜撰相对少的散文,忆述作者自1937年抗战至1982年远赴纽约的历程。即便杜撰性较低,若观察“母亲”的言行,还是能够发现作者对她的“艺术化”。1943年叙述者离开家里,独自前往杭州学习,开启其追寻艺术的道路。回忆当时的状况时,他说:

那时,我对于艺术,除了虚荣,别无角度可以介入……当初一袭长袍揖别故乡的,到得此时在外表上全盘西化了,这是四十年代初的浙江小镇上所做不到的。某日家信至,内示凡有从杭州回乡的亲戚长辈,都认为我单身在外,无人督导,显得华而不实——我深感委屈了,与我所梦想的“艺术家”相比,我真是表不及里,里不及表。^{[5]170-172}

叙述者坦言最初对艺术的向往完全出于虚荣,也在亲戚向“母亲”的告状中意识到自己“表不及里,里不及表”。这个自觉,说明叙述者已开始萌生对真正的艺术究竟为何的思考,是一个以艺术为业的人的成长过程中关键的一刻。这时若无人引导,没有人在他感到委屈时给他点明一些道理,叙述者有可能会采取不一样的行动来处理他的少年烦恼:放弃艺术、对这股虚荣不了了之,抑或停留于虚荣的追求……这些都是可能的。这时,“母亲”却以简洁的言行给予叙述者指点和肯定。当她来甄检叙述者时,不仅没有责备,还说出了一番充满智慧的话:

(我)陪母亲游山泛舟、逛街选物之余,添置了秋冬大衣各一、英国纹皮皮鞋、瑞士名牌金表,还印了几匣名片,母亲说:“先一步步学起来,以后就老练,独个子在外面,要懂交际,别让人家瞧不起”……“真的华而不实倒先得一‘华’,再要得‘实’也

就不难,从‘华’变过来的‘实’,才是真‘实’……你要‘华’,可以,得要真华,浮华可不是华……”^{[5]173-174}

“母亲”非但没有责备叙述者,还肯定了叙述者诚实地面对自己——超乎对和错观念的“诚”,导致叙述者勇于做到“赤裸到如实记录恶念邪念”^{[6]184}。“母亲”言语和行动上的支持不仅使叙述者获得信心,也领悟到保持“诚”的重要。这一场教育使他开始有别于其他流于浮华的“名门世家子弟”,懂得了“华”的目的乃是要获得“实”。

除了对“诚”的肯定,上述的事件还显示出“母亲”并不是盲目地服从某些刻板信念,她并没有听信叙述者亲戚的告状,以为追求“时髦”就全然错误。相反,她看待事件隐藏着自身的判断,其充满智慧的判断恰恰给叙述者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夏明珠》以“母亲”为主角,故事的冲突发生于“母亲”和夏明珠之间。其中,“母亲”的思考和行动使叙述者看见了一种超越善恶的判断。

母亲早已知道在上海工作的丈夫(叙述者的父亲)有外室——即夏明珠。在那个年代,“已婚的富家男主,若有一个外室,舆论上认为是‘本分’的”。父亲、孩子,甚至镇上的人都自然而然地不在母亲面前提起夏明珠,母亲也从不说什么,夏明珠亦不曾干扰他们,大家都明了自己的身份,懂得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种默契和氛围说明了社会道德的潜在。事件的转折发生在父亲忽然病故,夏明珠得罪洋场里的人而被迫迁回古镇。她恳求让自己与私生女归顺叙述者家,但却遭母亲“凛然回绝”。母亲在情的一面,确实不喜欢夏明珠,但不让她入家门的由衷却是夏明珠尚有三兄弟,皆为“流氓角色”,接纳她等于“引狼入室”,会威胁自己孩子的未来。这个理由不仅合理,而且合情。叙述者并不讨厌夏明珠,唯在义的底线上始终不称她一声“妈”,但却对她的敏锐、机智、品位十分赞叹,遂也对她颇具好感。事件的冲突随战争爆发而来临——夏明珠的洋派生活使日军怀疑她是间谍而将她分尸,母亲得知后落下眼泪,并吩咐仆人替夏女士收尸,安葬于祖坟,同时寻找夏明珠的女儿。私生女的下场是“已被卖掉,下落不明”^{[1]44-57}。

“母亲”和夏明珠的关系尤值得申论。二者分别代表社会道德的善与恶,但在这篇叙事中,她们并不是简单的善恶对立。善和恶分别在“母亲”和夏明珠身上一同起作用,使“智慧”/“意义”得以彰显。“智者”是瑞士分析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KarlGustavJung)在阐述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时所提出的三大原型之一,它也可以称为“意义的原型”(意义生成的原型)或“智慧老人”。“意义的原型”,根据荣格的定义,是“隐藏在生活混乱之中的在先的意义”的象征,它“向人们显示善和恶是如何一同起作用的”^{[7]55}。

镇上的人瞧不起夏明珠,认为她是放荡不道德的;相反,“母亲”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应当的。然而在“不懂道德、权谋,却凭着本能”的孩子(叙述者)眼中,二者的行为皆有各自的由衷及其如此行事之判断。叙述者起初对夏明珠有所警戒,但随着假日相处,他看到了夏明珠美好的一面。当父亲亡故、夏明珠厄运陡起时,母亲出于“自私,自卫本能”必须对夏明珠采取恶劣的行为。“母亲”的矛盾就在于恶劣行为的由衷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和保护。此时在叙述者眼里,“母亲”就如同戴上了恶的面具,夏明珠也因境遇恶化而更显其可悲可怜。两个矛盾挑战着叙述者的道德——“母亲”在保护孩子和怜悯夏明珠之间的矛盾,以及夏明珠的无辜和社会强加于她的道德谴责的矛盾。这不是白与黑的冲突,而是善与善的冲突,它给叙述者带来了混乱。叙述者在生活的混乱中,从“母亲”和夏明珠的行为感知到了“在先的意义”,同时也向他显示二者身上的善与恶如何一同起作用。根据荣格的观点,意义的生成——从感知到领悟的进发过程——首先“得把两个对立面看成具有同等的功能”,进而“从对立面中解放出来”^{[7]55}。这就是母亲和夏明珠两个角色的相互作用。叙述者从夏明珠身上领会了悲剧、命运。她选择跟随一位有妇之夫,很有可能考虑过社会舆论和自身处境的各种可能,哪怕没有这层考虑,这个选择至少诚于自己的欲求和感受。而父亲的亡故等于厄运的降临,她注定要领受一切全然悲惨的结局。因“诚”于自己而走向悲惨的命运,就是叙述者获得的新的意义。“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私爱而回绝夏明珠,但夏明珠的悲剧性收场却造成“母亲”心理的负罪感。

由此可见,作者“艺术化”“母亲”这个人物,是为了使叙述者(亦是读者)领悟一种超越平庸的善恶判断,走进新的意义领域(智慧就在其中)。在木心散文艺术的整体中,“母亲”作为“意义的原型”之象征,也是使叙述者得以建立起自身主体意识/精神的因素。

三、负罪的生命意识

“母亲”对叙述者的主体意识起着重要作用的方面,主要体现在“罪感”的建构。《夏明珠》结尾,叙述者领受到“母亲”对夏女士的负罪感,但也基于“母亲”的保护,他才能免于夏家三兄弟的威胁。叙述者的生可以说是由私生女的死换来的,因此,叙述者同时也背负这个“罪”。“罪感”的萌生和承担奠定了叙述者的生命态度。

《第一个美国朋友》也涉及出于爱而犯下“罪过”的主题。为了小叙述者的健康着想,母亲和孟医生为叙述者安排了扁桃腺切除手术。孟医生的关爱体现于他总以温和体贴的姿态同叙述者交流,使叙述者把他当作医院里唯一倾心交谈和信任的朋友。而母亲的爱则体现在手术进行当儿,因医院停电导致拖延,过度担忧而两度昏厥。手术进行时,孟医生按照医疗程序,麻醉并将叙述者的四肢固定在手术台上,但小叙述者却认为孟医生这样做是不信任他的表现,因而生孟医生的气。事后,孟医生请求他的宽恕。时过境迁,切除扁桃腺被证实是医学上的错误。这时,疼爱叙述者的母亲和孟医生都已不在人世。叙述者知道母亲和孟医生必会为自己在他喉咙上犯下的错误而感到罪恶及内疚,即使“我宽恕了他,他也不能宽恕自己”,这个医理上的错误“不是我所能原谅的”。^{[1]150-169}

无知使我们犯罪,而知识又是无底无尽头,这是我长大后渐渐明白的。^{[1]168}

母亲和孟医生限于医学知识而犯下错误,这种“无知”是可以由科学研究将其转变为知识;然而《夏明珠》里母亲的“无知”,就不那么简单——母亲不会预料到战事的到来,也不会想到夏明珠会被杀害。面对未来,知识显得有限,甚至常常是失效的。叙述者认为,学理上“常有被否定的东西后来又肯定”,暗示我们永远只能活在“无知”中;或者说,生命本身就是巨大的“无知”,就是一一直处于对“知”的索求,知识因此才“无底无尽头”。人只能带着“罪感”永远处于从无知通往知(索求意义)的道路上。小叙述者回忆孩提之事,才醒悟于自己当初“无知”于母亲和孟医生的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值得忧愁、焦急、宠爱的人,所以才这样的任性,这样的快乐”^{[1]169},因而萌生“罪感”。叙述者从“母亲”那里领悟到的“罪感”,也在回顾(反观)自身中建立起负罪的生命意识。

综上所述,“母亲”在木心散文艺术整体中的三种象征意义。《童年随之而去》凸显了“母亲”作为“预言者”,以其历练和智慧教导叙述者勇于坦然地面对事物可朽的真谛,接受现实中的文化式微但却不悲观绝望。用作者的原话说,是对“绝处死地有可能出现‘再生’(Renaissance)”^{[5]119}抱有希望。《战后嘉年华》和《夏明珠》的分析强调“母亲”作为“智者原型”的象征,引导叙述者获得超越善恶的判断。“母亲”肯定叙述者的“诚”,在此基础上以自身的遭遇,向叙述者展示善与恶如何在同一人身上同时起作用,进而使新的意义得以从两个对立面中解放出来。《第一个美国朋友》则显示“母亲”的负罪感如何奠定叙述者的“罪感”生命意识。木心“艺术化”“母亲”这个角色,是为了让其散文叙述者的主体精神得以诞生;换言之,“我”是木心散文的“目的”,“我”在经历这些事件后所领受的精神就是“袋子里的东西”,包括:无畏而面对绝境,超越善恶刻板观念的判断,以及对生命“无知”本质的体识而产生的“罪感”生命意识。由之可见,作者“把自己放进去”的叙事策略——如果将“我”比作耶稣,“母亲”就是木心散文叙述主体的施洗者约翰。

参考文献:

[1]木心.温莎墓园日记[M].新北:INK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2.

[2]木心.散文一集[M].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6.

[3]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5]木心. 鱼丽之宴[M]. 新北:INK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 2012.

[6]木心. 琼美卡随想录[M]. 新北:INK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 2012.

[7]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注释:

1 由于木心自称其“短篇小说”为“叙事性散文”,本文以作者作品中所创造的“母亲”形象作为讨论对象,故不对其“散文”和“短篇小说”作体裁上的区分,而着重于文中的叙事(Narrative)。

2(1)木心认为,一个优秀的讲故事者在讲故事时,会“把自己放进去”,自我投射于故事的角色之中。“以前母亲、祖母、外婆、保姆、佣人讲故事给小孩听,是世界性好传统。有的母亲讲得特别好,把自己放进去。”参见: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 文学回忆录(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475.